战争、民生与政治：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水利建设

杨可淳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全面抗战时期，自然灾害频发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农业发展普遍面临的困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晋冀鲁豫边区采取“政民结合”的策略，通过健全体制与完善立法相结合、设施修筑与日常维护相结合、水利贷款与技术人才相结合、水利建设与植树造林相结合等一系列全方位、立体化的措施，成功建造了一批经久耐用的水利设施。这些举措不仅满足了现实性与即时性的需求、更蕴含了长远性和系统性的考量。边区的水利建设成果显著，增加了粮食产量，保障了抗战供给，为持久抗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通过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壮大了抗战队伍，形成了广泛的抗战合力。此外，水利建设还具有一定的政治效应，有助于塑造我党的良好形象、增强民众的政治认同感，并显著提升了党的社会动员能力。

关键词：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2-0049-12

收稿日期：2025-03-09

基金项目：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23HSMY008）：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队伍建设研究。

作者简介：杨可淳（1997-），女，江西赣州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3.002

千百年来，水利问题始终是制约农业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之初就深谙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并相继提出一系列治水的思想、方针和政策。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党章草案》明确将“改良水利”列为我党的任务之一。①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一重要论断。② 中华苏维埃政府将水利资源收归国有，制定并实施了多项水利制度，建立了水利管理机构，从而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水利体系。③

在频繁的战乱中进行水利建设，以减少洪涝灾害，发展农业经济，进而支持革命事业，是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纵观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水利建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建设措施及其成就，而对于水利建设所产生的政治效应则关注相对较少。④

晋冀鲁豫边区地处华北中心，是领导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枢，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但该地区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且自然灾害频繁，水利建设难度较大，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特殊性。本文将水利建设置于战争与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以晋冀鲁豫边区为考察对象，探讨水利建设的政治贡献及其对抗战胜利的影响，以求教于方家。

---

①《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第 142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2 页。

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779 页。

④目前对于抗战时期根据地水利建设的研究并不多。张晓丽对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的类型、成就、作用和经验进行了梳理。（《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初探》，《中国农史》，2004 年第 2 期）牛建立从立法、组织、使用和管理方面入手，考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水利建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农田水利建设》，《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 2 期）张浩溟、吕志茹将华北抗日根据地水利建设归纳为“民办公助”模式，并探讨了该模式形成的原因及过程。（《华北根据地“民办公助”农田水利建设模式的形成（1944—1949），《党史研究与教学》，2024 年第 3 期）。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上看，主要关注的是多个根据地的水利建设，而非聚焦于某个根据地的水利建设。且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关注水利建设的措施及成就等。

一、边区农业的发展与水利建设的提出

1937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一二九师东渡黄河，转战至晋东南地区，并成功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这标志着晋冀鲁豫边区创建的伊始。

（一）边区农业发展的困境

战争需要大量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作为物质支撑。与中共所建立的大多数根据地一样，晋冀鲁豫边区也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随着山西和武汉的相继沦陷，冀南游击区与后方的交通联系被切断，导致经济贸易与物资调剂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① 面对日军严密的封锁政策，晋冀鲁豫边区不得不寻求自给自足、自力更生。

发展农业生产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②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发展农村经济，确保战时农产品自给自足。③ 1939年5月，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向各兵团发布指示，一切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不得依赖国民党政府接济。要坚决与敌人进行经济封锁斗争，打破国民党企图通过物质限制我军发展的阴谋。同时，指示中还强调应大力发展生产运动，尤其鼓励多种瓜菜和粮食。④

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高度依赖于当地的自然生产条件和农业发展水平。晋冀鲁豫边区地形复杂，多高山丘陵，孕育了无数条大小河流，包括漳河、沁河、卫河等。边区内也分布着广阔的平原，其中黄河作为边区平原地带最大的河流，流经边区境内17个县，长达550公里。⑤ 众多河流虽滋养了边区人民，但也带来了诸多自然灾难，如水灾、旱灾、蝗灾等，严重阻碍了边区农业经济发展。1939年，华北地区遭遇几十年一遇的大水灾。据驻河南日伪报道，黄河东岸的太康、通许、杞县，豫北漳河、卫河两岸的获嘉、新乡、彰德、汲县、临漳、内黄等县受灾尤为惨重。⑥ 漳沁地区的缺口引发山洪暴发，淹没田禾总计不少于313 200亩，导致当年秋收产量不及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⑦ 由此可见，频繁的自然灾害对边区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边区水利建设的提出

如何有效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损害，是边区经济建设亟待解决的难题。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坚信农业具有极大发展潜力和必然性，强调不应“等待和任其自然发展”，应从技术层面入手，“帮助、推动、保证和达成这种发展。”因此，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条件，通过改进技术设备，使农业生产的方式方法“逐渐走向现代化、科学化。”⑧ 这充分表明，晋冀鲁豫边区积极倡导利用技术手段尽可能地促进农业发展，以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害。

---

①罗青：《冀南游击区的经济建设工作》（节录），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邯郸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路军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料汇编与研究》（第1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1页。

②李富春：《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 第1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14页。

③《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29页。

④《朱德等关于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给各兵团的电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

⑤赵秀山：《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年，第2页。

⑥《豫省各县灾情奇重》，《新河南日报》1939年9月12日，第3版。

⑦《马庭松等陈述豫北遭受日寇蹂躏及水旱蝗灾造成田园荒芜人相食的代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第3编 财政经济》（6），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8页。

⑧罗青：《冀南游击区的经济建设工作》（节录），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邯郸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八路军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史料汇编与研究》（第1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2页。

水利技术是有效抵御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的关键手段。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自然条件的制约下，它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容忽视。1937 年 10 月，刘少奇在《抗日政府的各项政策》中明确指出，各根据地应当“认真办理水利及救灾等事”。① 然而，在晋冀鲁豫边区创建初期，水利建设基础极为薄弱。

首先，频繁的战乱导致水利设施遭受严重破坏。1938 年 8 月，日军决开沁河河堤，随后决开广济河的李庄、七里屯、南寻村、南鲁村等地的堤防，“适值日来阴雨，河水暴涨，以致大水急流，沁西尽成泽国”。② 1939 年 9 月，日军又将河北的猪龙河、永定河、唐河以及冀南的沙河、卫河等多条河流的河堤决开，导致山东、河北两省大范围地区洪水泛滥。其次，水利设施匮乏也是水利建设基础薄弱的显著表现。以太岳区为例，尽管该地河流密布，但水利设施严重不足。据太岳行署调查显示，该区绵上县仅有四道渠；沁源县仅有两道渠和少量井；安泽县则有六道渠和一些水车。沁县、屯留、长子等地几乎没有水利设施，水利状况堪忧。③ 再次，水利绅权化问题严峻，导致水利纠纷频发不断。地方水利的管理权往往被地方豪绅和地痞垄断，他们经常“依势作恶，蒙上欺下”。水利专家陈靖曾指出，地方水利管理中，“事务多于公务，人情多于公理，不脱旧式官僚习气。”④ 这导致水资源分配不公，民众因用水问题频繁产生争执，甚至出现争水斗殴、“下村向上村叩头乞水”的现象。⑤ 最后，贪污腐败盛行，透露出水利管理体制的弊病。全面抗战爆发前，太行山区的柏峪、上遥、东社等村庄曾集资重修漳南、漳北大渠。但修筑筹款被乡村豪绅贪污，东社村虽提起诉讼，却未得到公正处理，致使村民对开渠修渠望而却步。⑥ 由此观之，边区水利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基于此，晋冀鲁豫各区相继开启了水利建设的历程。

二、晋冀鲁豫边区建设水利的主要措施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全方位、立体化的措施，推进水利建设。

（一）加强管理：健全体制与完善立法相结合

健全的管理体制是保证水利系统顺利运行的基础。首先，边区政府设置建设厅总管边区各项建设事宜。1941 年 9 月，边区颁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边区政府下设建设厅，负责掌管边区内的农林、畜牧、水利、工业、商业、矿业、交通等事业。⑦ 其次，边区政府在建设厅下设置水利局作为专职主管部门。1940 年 7 月，太北区指示根据地建立水利局或水利委员会，规定“有大河的县组织水利局，没有大河的县组织水利委员会（附设在实业科内）。”⑧ 最后，在水利设施建造和管理的一线成立水利委员会。例如，修建涧南渠时组建涧南渠水利委员会，统领整个水利工程。至此，晋冀鲁豫边区内各级行政区普遍设立了水利部门，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水利管理体系，为边区水利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制定水利条例、完善规章制度是加强水利管理的重要举措。在水利修筑过程中，经常产生土地纠纷和

---

①刘少奇：《抗日政府的各项政策》，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34 页。

②《豫北敌军掘堤、屠杀，沁阳全境尽成泽国》，《河南民国日报》1938 年 8 月 15 日，第 2 版。

③《太岳行署水利局太岳区水利工作总结》，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75 页。

④陈靖：《水利管理之片见》，《水利》，1937 年第 12 卷第 2 期，第 135-140 页。

⑤《太岳行署水利局 1943 年工作总结》，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39 页。

⑥《太行三大渠完工可灌田九千八百余亩》，《解放日报》1944 年 9 月 17 日，第 1 版。

⑦《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政权建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06 页。

⑧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在太北区财经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207 页。

生产问题。[①] 1940年，冀太联办根据北方局指示，颁布《水利工程草案》，为边区水利条例的制定奠定基础。[②] 随后，为适应水利发展的需要，晋冀鲁豫各区相继颁布水利条例。其中，1943年1月太行区颁布的《兴办水利暂行办法》较具代表性，是一部相对完备、权责分明的水利条例。从适用范围来看，它几乎涵盖了边区的各种水利设施和水利工程，包括开渠、修渠，筑堤、修滩、水车等事项。[③] 它赋予边区政府裁决纠纷的权力，明确水利部门设计、实施、监督水利工程的职责。《兴办水利暂行办法》中所提出的分摊准则为解决水利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使水利建设有章可循。

制定工作制度，建立奖惩机制，是提高工程质量、加强水利机构自我管理的主要手段。在水利建设过程中，“推诿、偷懒、怠工”[④] 等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水利管理机构制定工作章程，要求工人严格遵守工作纪律。例如：涧南水利委员会规定工人日出上工点名，日落下工，迟到每次罚洋30元，无故旷工每天罚米3升。[⑤] 安泽县贾寨在防冲修滩时根据劳力大小和成绩评定工分。

晋冀鲁豫边区通过健全体制与完善立法的方式加强管理，从立法、组织和规章三个维度，为水利建设提供法律依据、组织保证和制度规范，从而保证了边区水利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三位一体：水利修筑与设施维护相结合

晋冀鲁豫边区水利设施种类繁多，涵盖开渠、掘井、防河、蓄水、掘泉、制造水利工具及拨船水磨等各个方面。[⑥] 边区政府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造就了一批经久耐用的大型水利设施。如1942年涉县贷款160万元，贷粮19万斤，历时近两年，发动漳南八个村庄的村民共同建造了边区最大的水利工程——漳南大渠。[⑦] 然而，由于战争频繁、经济困难，建造大型水利设施面临资金不足、人力缺乏、工期较长等诸多挑战。1943年，黎城、涉县兴修的两项大型水渠工程，其实际工程量远超预先估计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边区政府投入三百余万元贷款修筑的大渠，可灌溉土地八千余亩，而开挖小型水渠等增加的水田面积相当，且仅花费三十万元贷款。[⑧] 鉴于此，边区政府倡导民众自发兴建成本低、人力需求少、管理简便、见效迅速的小型水利设施。自1940年起，太岳行署将水利建设的重心转向开挖水渠、整治滩地、凿挖水井、修建水磨等易于实施的项目。[⑨] 1942年，太行区在生产总结中明确提出，未来应更加重视推广开挖小渠、打井、建设水库等举措。[⑩] 边区政府在致力于大型水利工程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小型水利设施的重要性，力求通过不同规模、多种类型的水利设施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

---

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发去漳南大渠有关土地、生产问题处理决定的命令＋漳南大渠有关土地、生产问题处理的决定》（1940年7月30日），档号：A198-0005-0032-0007，山西省档案馆藏。

②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1937—194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③《太行区兴办水利暂行办法》，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④《太岳行署水利局1942年工作总结》，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29页。

⑤《涧南渠工程检查报告》，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61页。

⑥李一清：《从太北财政经济建设中巩固太北抗日根据地——在太北区财经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

⑦张耀义：《涉县水利话今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涉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涉县文史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94年，第184页。

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水利工作及贷款的指示》（1943年11月16日），山西省档案馆藏，档号：A198-0005-0030-0011。

⑨《太岳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工作概述》，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上），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6页。

⑩《一年来太行区生产建设》，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19页。

水利设施建成后并非一劳永逸，需注重日常维护。晋冀鲁豫边区构建了边区政府、水利部门、水利机构三位一体的维护体系。其中，边区政府负责统筹、水利部门进行监督，水利机构组织实施。

水利机构负责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以保障其稳定运行。作为半官方、半群众性的水利机构，水利委员会通常由当地村民组成，采用“谁使用谁维护”的方式，充分利用民众力量。涧南大渠竣工后，上游堤坝时常坍塌，涧南水利委员会每日组织26个工人进行补修，确保水利设施的日常运转，亦可延长水利设施的使用年限。[①] 水利委员会作为最基层的水利机构，在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水利部门负责定期检查水利设施，制定修补计划，并监督修缮工程的实施。1942年，太岳行署水利局对岳北水系进行全面调查，排查出一批年久失修的水渠。在对水渠的修补工程量进行评估后，有计划地组织实施了补修工程。1944年，涉县水利局遵循“必须重修的坚决重修，能以补修的则补修，无法修复的则不予修复”的原则，对南五村大渠、石梯渠、原曲渠、太仓渠的渠口及渠身进行了细致修补。[②] 水利部门对水利设施维护工作的有效监督，为水利设施的正常运行和维护管理提供了有力保障。

边区政府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推进水利设施的灾后修复工作。战争与洪涝灾害对边区水利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与日常维护不同，水利设施的灾后修复工作对时间、效率、人力、物资等方面的要求较高，单凭水利部门难以独自承担。因此，边区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科学合理地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1942年，太行区政府组织一批年轻力壮且因灾失业的民众，参与堤坝的修筑工作。在清漳与浊漳的两岸，修建了数十条堤坝，并开垦出一万余亩滩地。同年下半年，太行区政府吸收23 000多名灾民参与修渠开滩，支付工资145 000元[③]，既解决了灾民的生计问题，又推动了水利设施的重建。

三位一体的维护体系体现了边区政府在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充分发挥了边区政府、水利机构和水利部门的优势，加强了三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保障了水利设施的修筑与维护。

（三）物质支撑：水利贷款与技术人才相结合

水利贷款是边区政府为解决水利建设的资金问题而提供的金融支持。1938年9月，晋冀豫边区政府积极提倡银行放款、低利借贷与水利建设紧密结合。[④] 随着水利建设项目的持续推进，水利贷款在总体上呈现出贷款额度不断增长、贷款门槛逐步降低的趋势。

以太行区为例，从1942年至1944年，太行区冀南银行水利放款总额逐年攀升，分别达到402 830.40元、4 615 431元以及6 173 942.6元。同时，水利贷款在冀南银行放款总额中所占比重也逐年增加，分别为1.5%、5.5%和6.6%。[⑤] 这一现象表明，太行区水利贷款总额的持续上升及其占区内贷款总额比重的逐年增长，充分反映了边区政府对水利建设的高度重视与持续投入。

1941年，冀太区出台生产贷款办法，为大型水利工程提供贷款支持。[⑥] 随后，为了进一步推动水利建设，水利贷款门槛逐步降低，申请手续也得以简化，更加便捷地向普通民众开放。1942年3月，为鼓励群众自发兴建小型水利设施，边区政府正式颁布《农业贷款办法》，明确规定“贫苦农民、抗属及受灾严重的

---

①《涧南渠工程检查报告》，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59页。

②涉县一区区长李庆：《涉县漳南大渠总结》，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79页。

③《太行区一九四二、一九四三两年的救灾总结》，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392页。

④《晋冀豫区党委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决议》，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04页。

⑤《历年来太行区金融货币统计资料》，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970-974页。

⑥《冀太区生产贷款办法》，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888页。

农民享有贷款优先权”。[①] 贷款者只需自行寻找担保人或以实物抵押借款。在此之前，边区内出现“贷款不择人，用途不深究”的情况，导致部分区县发生将水利贷款挪用于娶妻、赌博、经商等非水利建设用途的现象。[②] 为此，边区特别强调应对贷款人资质及贷款用途进行严格审定，确保贷款资金真正用于合理且必要的水利建设。[③]

技术人才是根据地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1940 年 12 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提出要从大后方、敌占区广泛吸收技术人才，并对技术人员给予优待。[④] 随后，边区政府积极响应，逐步将技术人才培养制度化。1941 年 11 月，边区正式颁布《晋冀鲁豫边区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对不同级别的技术人员津贴标准进行规定，如“现任工程师者，每月给津贴费 40 元至 50 元；现任技正者每月给津贴 30 元至 40 元；现任技士者每月给津贴 20 元至 30 元；现任技术员者，每月津贴 15 元至 20 元”[⑤]，这一举措为引进水利技术人员提供了物质保障。1942 年太行第三专署鉴于浊漳水利局技师王子香（该技师毕业于山西大学机械系，但因家庭负担沉重而面临困境）的杰出贡献，特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申请提高其津贴待遇。[⑥] 这一举措进一步体现了边区政府对技术人才的重视与关怀。1944 年，太岳行署为广泛团结各类技术人才，激励技术创新与发明，颁发了技术人才调查表，召开了技术人才座谈会，积极动员各类技术人才投身根据地建设，共同为边区的水利建设贡献力量。[⑦]

（四）系统治理：水利建设与植树造林相结合

水利建设的核心，实质上是在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人为的力量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与优化配置。科学的水利建设，不仅能够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增产增收的目标，同时也能够有效调节水资源分布，减少水旱灾害的影响。衡量水利建设成功与否的标准，不仅局限于水利设施的数量多寡，更在于是否构建了可持续的水利生态系统。

全面抗战期间，晋冀鲁豫边区受战争摧毁、人为破坏、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水利设施损毁严重、水灾频发，进而加剧了生态系统内部的恶性循环。尽管太行区水利建设具有一定成效，但频发的山洪仍冲毁大量耕地。边区逐渐意识到，仅依赖水利设施的建设难以全面提升水利建设的成效，还必须同步改善生态环境。水域生态系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整体，其中各个组成部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因此，水利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致力于保护和修复水生态系统，强化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森林能够涵养水源、截留雨水、抑制蒸发并保护生态环境。植树造林与水利建设是统一的有机整体，两者在生态系统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此，太行区进行深刻反思，认为单纯依靠水利建设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应该从长期着眼，从造林植树方面来补救”。[⑧] 1940 年 4 月，冀南行政主任公

---

①《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农业贷款办法》，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890 页。

②《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春耕贷款问题给清浊漳水利局的指示信》（1942 年 3 月 16 日），档号：A198-0005-0028-0007，山西省档案馆藏。

③《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关于春耕贷款问题给清浊漳水利局的指示信》（1942 年 3 月 16 日），档号：A198-0005-0028-0007，山西省档案馆藏。

④《戎伍胜副主任的总结报告（摘要）》，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242 页。

⑤《晋冀鲁豫边区优待专门技术干部办法》，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1288 页。

⑥《太行第三专署关于浊漳水利局技师王子香津贴待遇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请示加履历》（1942 年 5 月 21 日），档号：A198-0002-0046-0002，山西省档案馆藏。

⑦《太岳行署关于动员团结各种技术人才的指示》（1944 年 8 月 1 日），档号：A071-0002-0028-0001，山西省档案馆藏。

⑧《太行区三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2），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203 页。

署发布关于植树造林的布告，强调植树造林“既可调节雨量，又能改良土质”[①]。太岳行署提出，从长期建设根据地的战略高度来看，植树造林具有极大意义。[②] 这一转变标志着边区政府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与植树造林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

1940 年 3 月，在春耕运动的高潮中，冀南行政公署提出“一人要栽一棵树”的号召。[③] 边区政府将植树造林和水利建设联系起来，通过颁布法令及广泛动员机关民众的方式推动植树造林。1942 年 3 月，晋冀鲁豫边区为太行区制定农业生产计划，要求全区每人植树 1 株，各机关、学校及地方武装集体行动，每人至少植树 2 株。1943 年 3 月，晋冀鲁豫边区发起植树运动，要求各级干部及高小以上学生每人植树二株，群众每二人植树一株。[④] 保护山林与植树造林同样重要，边区强调“植树只是消极的造林，应当认清保护山林才是积极的造林”。[⑤] 为保护山林，各地实行禁林、禁山、禁坡的措施，严格规定管理办法和采伐制度。1941 年 10 月，边区颁布《晋冀鲁豫边区林木保护办法》，规定“为固结土壤以防水患，山间野生灌木之根一律不得掘采”[⑥]。

纵观全局，无论是实施大型水利工程的“以工代赈”策略，还是推动群众性小型水利设施的兴建，均凸显了政府的积极引导与群众的密切配合。在“政民结合”的模式下，党和边区政府始终坚定不移地发挥着对水利建设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积极履行其多重角色：作为建设的统筹者、政策的制定者、资金的支持者、技术的推广者，以及纠纷的调解者。这一模式的显著特征，在于边区政府通过搭建水利管理体系、出台水利相关政策、培养水利专业人才、推广水利技术等途径，为边区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策支撑和组织保障。与此同时，“政民结合”模式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激发人民群众在水利建设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始终坚持“一切依靠人民”。正因为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才能汇聚成水利建设的伟力。

三、晋冀鲁豫边区水利建设的历史成效

（一）保障供给：增加粮食产量，支持持久抗战

提高农业生产是解决边区经济困难、推动经济建设的核心环节。只有农业生产发展才能确保军队供给，满足根据地民众的生存需求。水利设施的修建改善了边区农田水利灌溉条件，有效扩大了灌溉面积。1942 年，太行区十一个县共修河滩地 4 170 亩，共增加水田 7 918.6 亩。通过以工代赈修建三条大渠增加水田1 4800余亩。[⑦] 同年太岳区沁源县修筑的三益渠长 12.5 里，灌溉面积达 2000 亩，为四维村、韩洪沟、有义村的村民解决了灌溉用水问题。1945 年沁南县修成的涧南大渠，解决了交口等村千余群众的喝水问题，使四村千余亩旱田变成了水田，挽救了二百多亩将要旱坏的麦地。[⑧] 水利设施的建设，合理整合了边

---

①《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关于植树造林的布告》，《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46 页。

②《太岳行署关于植树造林的指示》，《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48 页。

③《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关于解决粮荒开展生产的决定》，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4 页。

④《晋冀鲁豫边区关于掀起植树运动的指示》（1943 年 3 月 6 日），档号：A198-0005-0029-0006，山西省档案馆藏。

⑤《太岳行署关于植树造林的指示》，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48 页。

⑥《晋冀鲁豫边区林木保护办法》，《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2 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47 页。

⑦《一年来太行区生产建设》，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2），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97 页。

⑧《太岳涧南大渠落成灌田一千余亩节工三万个》，《解放日报》1945 年 6 月 10 日，第 1 版。

区的水利资源，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用水和农业灌溉。

边区灌溉面积的扩大促进了粮食的增产。1943年，在太岳区的士敏、安泽、冀氏等地，共有9 056亩旱田被成功改造为水田，若以每亩平均增产一石计算，则该地区每年可增产9 056石。[①] 1944年太行区十七个县积极修滩造地，共新增耕地面积12 351.63亩，若以每亩修滩修地平均增产二斗五升计算，则可增产2 900石。全区军政民开荒和修滩修地共增加土地348 237.63亩，预计可增产细粮139 000石。涉县王堡、黎城大寺和上遥三个大渠，修成后，每年可增产细粮981 075斤。[②] 边区水利设施的建设与改善，增加了粮食产量，缓解了根据地粮食短缺的问题，为持久抗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人民抗战：凝聚各方力量，壮大抗战队伍

人民群众是抗战胜利最深厚的伟力。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③]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广泛发动人民群众，汇聚各方力量助力水利建设。

1939年，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提出应当将水利工作"做成一个群众运动"[④]。在边区政府的积极倡导下，广大群众迅速响应，掀起了水利建设的浪潮。民众"不仅转变了'磨洋工'的现象"，而且主动要求在黑夜刨暗洞。[⑤] 太岳区南阳的王拴元、王义得等村民主动捐出木板八丈多用于接水，王义功捐铁104斤帮助修渠，王成朝将盖房的石头捐出用于修渠。[⑥] 此外，一些妇女和儿童也参与其中，承担了水利建设中相对较轻的建设任务。

边区的水利运动不仅广泛动员了人民群众，也汇聚了来自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边区政府规定，各种专门性质的委员会在必要时可聘请当地党组织、军队、民众团体及士绅代表参与其中。[⑦] 因此，水利委员会通过广泛吸纳社会各界优秀人才，增强了水利建设力量。1940年12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伍胜提出要从大后方及敌占区积极引进技术人才，并给予技术人员优待。[⑧] 例如，在修建漳南大渠过程中，为攻克技术难题，邓小平同志亲自部署，从河南聘请30余名经验丰富的石匠参与建设。[⑨] 这一举措充分表明，水利建设已成为一项全边区民众、跨越不同阶层界限的共同事业。它不仅在无形之中凝聚了各方力量，更在精神上增强了民众间的团结与协作，为抗战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四、晋冀鲁豫边区水利建设的政治效应

（一）塑造了中共"为民执政"的政党形象

---

①《太岳区一九四三年春耕工作总结》，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②《太行去年生产成绩巨大》，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2），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36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55页。

④杨尚昆：《华北党目前的任务》，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8页。

⑤《涉县一九四四年生产结算》，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469页。

⑥《涧南渠工程检查汇报》，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63页。

⑦《晋冀鲁豫边区县政府组织条例》，山西大学晋冀鲁豫边区史研究组编：《晋冀鲁豫边区史料选编》（第2辑），内部发行，1980年，第407页。

⑧《戎伍胜副主任的总结报告（摘要）》，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242页。

⑨涉县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馆编著：《邓小平的涉县岁月》，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政党形象是基于政党符号、政党纲领、政党成员、政党行为、政党绩效以及政党能力等多方面因素，在其党内外和国内外各类行为体中所形成的情感认知与综合评判。[①] 其中，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及其解决的实际成效，构成了人民群众评判一个政党优劣的重要标准之一。水利建设作为关乎民生福祉的重大工程，其取得的显著成就不仅是评估政党执政绩效的重要指标，也是直接反映政党性质与宗旨的一面明镜。

1938 年 5 月，为阻止敌军西犯，国民政府置人民生死存亡于不顾，下令实施花园口决堤，此举引发了大规模洪水泛滥，致使无数村庄遭受洪涝之灾。尽管花园口决堤形成的黄泛区在一段时间内成了阻挡日军进攻的天然屏障，但也给黄泛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毁灭性打击：不仅原有的水利设施被彻底摧毁，民众赖以生存的家园和田地也大多被洪水淹没或泥沙掩埋。[②] 毋庸置疑，国民政府采取的“以水代兵”战争策略，在造成黄泛区生产、生态严重破坏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政治形象。

与之相反的是，中共以边区水利建设的成就为依托，充分利用报纸媒介，成功塑造了其“执政为民”的良好政党形象。1942 年 4 月 2 日，《解放日报》对太行山区蓬勃发展的兴修活动进行了详细报道。报道提及，彭德怀副总司令在漳河中段筑堤开工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军指战员及政工人员，应时时刻刻心系人民疾苦，为人民排忧解难。[③] 次年 1 月 30 日，该报再次报道太行区政府发放一百万元水利贷款，并已将款项分配至各县，此举彰显了太行区政府对人民群众修建水利的大力支持。[④] 1944 年 8 月，《解放日报》报道冀南地区党政军携手人民群众，通过广泛的打井运动成功抵御干旱的壮举。报道强调，帮助老百姓克服旱灾，是“人民子弟兵”的本色体现，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⑤]

然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兼顾战备与民生确非易事。中共在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这在水利建设中也有所体现。全面抗战时期，敌军为瓦解我党我军、破坏党群关系，频繁对中共进行负面宣传。在涉县漳南大渠修筑期间，日军与国民党顽固派便散布诸如“八路军修渠非为灌溉，实为挖掘战壕便于逃跑”等荒谬谣言。[⑥] 这些不实之词不仅给水利建设增添阻力，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和边区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涉县漳南大渠顺利竣工后，解决了沿岸八个村庄的用水问题，使敌军的谣言不攻自破。边区水利建设的成就，不仅是对敌军谣言的有力反驳，更有效地巩固了党和边区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正面形象。

由此可见，中共在边区水利建设中采取的施政措施，充分彰显了党和边区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塑造了中共执政为民的政党形象，进而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凝聚了更广泛的民心力量。

（二）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作为一种心理现象，其得以产生的起点是人的需求，而需求的满足与实现必须经由社会关系的媒介转化为实际利益。当政治体系所展现的治理成效或政绩能够契合并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求时，政治认同便自然而生。[⑦] 正如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进行工作总结时强调，一个真正廉洁奉公、坚持抗日、深切关怀人民疾苦、致力于解除民众痛苦、以民众利益为自身利益、与民众同舟共济的政府，方能博得广大民众的信赖与拥护。[⑧]

水利的建设，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民生福祉。党和边区政府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置于首

---

①何鹏程：《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政党形象塑造》，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16 年，第 11 页。

②唐金培：《河南水利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 年，第 372 页。

③《太行山区军民修水利》，《解放日报》1942 年 4 月 2 日，第 1 版。

④《太行水利贷款百万漳河流域修滩开渠》，《解放日报》1943 年 1 月 30 日，第 1 版。

⑤吴宏毅：《打井运动冀南救灾运动断片》，《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31 日，第 4 版。

⑥涉县一区区长李庆：《涉县漳南大渠总结》，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77 页。

⑦胡建：《政治认同的理论解读：内涵、结构及功能》，《广西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2 期，第 110 页。

⑧杨秀峰：《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对冀南行政区参议会的工作报告》，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等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 1 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465 页。

位，当根据地遭遇灾荒时，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将水利建设与灾荒救济相结合，一方面提高了根据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帮助人民群众渡过难关，有效保障了民众的生命安全。由于敌占区和国统区救灾不力，众多灾民纷纷涌入晋冀鲁豫边区。为此，边区专门颁布接受难民条例，确保难民妥善安置。流入根据地的灾民无不感叹："从地狱到了天堂，从死路到了活路，快要死了的人，叫老百姓的政府，搭救出来啦！"① 1942 年夏季，太行区发生了严重的旱灾，杨秀峰主席和戎伍胜副主席亲自前往太行第五、六专区视察灾情，并鼓励群众兴修水利，边区群众称赞："活了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好的官"。② 鉴于战乱、灾荒以及物价下跌等情况，边区对水利贷款实行减免政策。1945 年，冀南银行为缓解群众因物价下跌而遭受的困难，特别推行减免水利贷款的政策，这一举措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③

晋冀鲁豫边区水利设施的修筑，解决了部分民众日常饮水和灌溉用水的困难，为边区民众生产生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位于涧河下游的洞沟、席家、交口、南阳四个村用水困难。沁南县府组织军政民三方力量，修建了长达 20 华里的涧南渠，解决了老百姓几代以来未能解决的饮水问题。涧南渠未兴工之前，群众一致认为水绝对流不到南阳，甚至有的群众表示"这是多年多代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不是妄想吗？"涧南渠修筑成功后，展现了中共的执政能力和办事效率，群众纷纷表示"八路军真有本事，多年多代改不下的水，现在居然下来了。""八路军真有人家的天份，说甚做到甚。"④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始终是决定革命胜负的关键因素。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党在领导艰巨的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始终不忘重视民生事业的建设，这充分彰显了我党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晋冀鲁豫边区的民生建设实践，不仅巩固了党在局部执政的群众基础，也极大地增强了工农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

（三）锻炼了中共对人民群众的动员能力

无论是革命还是战争，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显著标志，也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晋冀鲁豫边区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党和边区政府逐渐认识到群众动员对于水利建设的重要性，并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对群众动员的机制、策略和方式等进行了相应的调适。在此过程中，中共的动员能力得到逐步提升。

随着水利运动的推进，边区干部对动员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建设初期，由于边区民众对修建水利设施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建设效率低下，出现"一天的工作，两天作不完"的现象，进而影响灌溉效果，使得"应灌的地灌不上，应有的效果收不到"。⑤ 针对该现象，1942 年太岳行署水利局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总结出三大原因：一是群众工作基础薄弱，群众团体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二是部分村干部态度消极。三是群众团体与水利建设部门之间缺乏有效配合。以三益渠的修建为例，由于"没有把开渠变成群众自觉的运动"，且"在群众中没有坚强有威信的领导核心"，进一步凸显了群众动员不足的问题。⑥ 对此，太岳行署水利局于 1942 年提出在组织上配备专门负责动员和组织群众，并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的干部⑦，这充分显

---

①吴宏毅：《从灾荒中站起来——记晋冀鲁豫边区的生产救灾运动》，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1)，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661 页。

②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73 页。

③《冀南银行太行区关于减免农业、水利贷款的指示》(1945 年 5 月 12 日)，档号：A203-0001-0083-0016，山西省档案馆藏。

④《涧南渠工程检查汇报》，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62 页。

⑤《太岳行署水利局 1942 年工作总结》，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29 页。

⑥《太岳行署水利局 1942 年工作总结》，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29 页。

⑦《太岳行署水利局 1942 年工作总结》，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31 页。

示了其对群众动员工作的高度重视。

为提升动员效果，边区政府不断探索和创新动员方式。从最初的以口头说服为主，逐渐发展到精神与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动员制度。1944 年 11 月，太岳行署颁布《选举英雄及奖励办法》，正式确立对水利英雄的奖励机制，包括物质奖励（如农具、工具、衣物、奖金、奖章、奖旗等）和精神奖励（大会表扬、宣传事迹、授予奖状和荣誉称号等）。① 1945 年，岳北区赵城评选王相义为水利英雄，并将其水利建设的经验在全区范围内广泛推广，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② 此外，边区政府因人制宜，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动员口号。动员当地驻军参与兴修水利，提出："动动手、帮帮忙，好平地，好操场"的口号。③ 动员地主时，则强调"防冲保卫你的土地"，对于热心公益事业人士，则呼吁"修坝防冲是社会的公益事业"。④ 在"人人劳动，个个有利"的广泛宣传下，群众逐渐认识到水利事业与自身利益的紧密关联，从而更加积极地投身水利建设。

结　语

全面抗战时期，水利建设被视为晋冀鲁豫边区"生产计划的中心环节"⑤。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健全体制与完善立法相结合、设施修筑与日常维护相结合、水利贷款与技术人才相结合、水利建设与植树造林相结合等一系列全方位、立体化的措施发展边区水利事业。党和边区政府凝聚各方力量，兴建了一批经久耐用的水利设施，有效减少了洪涝灾害，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保障战争供给，支持持久抗战。同时，边区水利建设具有特殊的政治效应，塑造了中共"为民执政"的政党形象，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中共的政治认同，锻炼了中共对人民群众的动员能力。

综而观之，晋冀鲁豫边区水利建设的措施兼具现实性和即时性、长远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边区发展群众性的小型水利设施，贯彻"多浇一亩就浇一亩，多种一亩就种一亩"⑥ 的策略，从而顺应了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契合保障供给的抗战任务，体现出水利建设"现实性"的特点。边区政府在特殊的灾荒时期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兴修水利，以求快速恢复地利和生产力，符合灾荒救济的"即时性"要求。尽管处于战争年代，边区仍然不惜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建造经久耐用、造福世代的大型水利设施，体现了边区政府不拘泥于"战争与革命"的眼光和考量，凸显其"长远性"的特征。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利用水利建设与植树造林双管齐下，运用整体视角进行系统治理，体现了晋冀鲁豫边区在水利建设中的"系统性"。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是中共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并服务于抗战需要和根据地发展的过程。这充分表明革命战争年代，党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同时，也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全面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水利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展生态建设的光辉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的理念，与今天的"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的理念具有相通相融之处，为当下统筹规划生态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

①《太岳军区和行署共同颁布选举英雄及奖励办法》，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上》，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 年，第 611 页。

②《岳北区赵城水利英雄王相义材料》（1945 年 1 月 20 日），档号：A071-0001-0035-0003，山西省档案馆藏。

③《安泽县贾寨防冲修滩的胜利》，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66 页。

④《安泽县贾寨防冲修滩的胜利》，李长远主编：《太岳革命根据地农业资料选编》，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567 页。

⑤《晋冀豫区党委关于春耕运动的指示》，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2），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267 页。

⑥《一年来太行区生产建设》，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 河南部分》（2），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年，第 94 页。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水利建设的发展历程还体现了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对区域执政模式的探索。党和边区政府在水利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政民结合”的施政模式。在此模式下，政府的主导地位不断加强，民众的主体作用得以凸显。从边区政府和普通民众两者之间的互动视角来看，“政民结合”的水利建设模式，改变了以往传统的政民关系，激发群众主动发挥其主体性作用，而不是令其被动加入到水利治理中，促使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水利建设中创造“政民结合”的模式，在于其执政为民的初心和强大的动员能力。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共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优势所在。

Wa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politics: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the border area of Shanxi, Hebei and Hen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YANG Ke-chu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frequent natural disasters were a comm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ilemma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of North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is the lifeblood of agriculture. The Jin-Hebei-Lu-Henan border area has built a number of durable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through a series of all-round and three-dimensional measures,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and people, the combination of sound system and perfect legisl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facility construction and daily maintenance, the combin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loans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nd afforestation. These measures are both realistic and immediate, long-term and systematic.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the border areas increased grain production, guaranteed the suppl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us supported the lasting war of resistance. The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in the border area consolidated the forces of all parties, strengthened the anti-Japanese troops, and thus led the people's Anti-Japanese War.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also has a certain political effec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shaping of the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trengthening of political ident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mobilization ability.

Key words: Shanxi; Hebei; Luyu; anti-Japanese base area; water conservanc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山阳]